

## 论鲁迅思想中的儒侠色彩

焦振文, 韩 燕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鲁迅先生思想是多元而又辩证统一的,在这多元的思想因素中就包含着儒侠思想。对于传统的儒学,鲁迅有着不自觉的承袭,而侠则是其儒学思想的行为外化。

**关键词:**鲁迅;传统文化;侠文化;儒侠思想;鲁迅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1-0096-04

关于鲁迅思想中的任侠色彩有些学者进行过阐述,他们或侧重讨论鲁迅对侠的评论,如袁良骏先生的《鲁迅与侠文化》,周秀葱的《瞿秋白与鲁迅论侠文化》;或侧重于从墨家角度来论述鲁迅先生的侠义思想,如薛柏成教授的《鲁迅的墨学观》;或侧重于从心理学、地缘学的角度来探讨鲁迅与传统的侠义精神或思想关系,如陈江华的硕士学位论文《侠之狂者——论鲁迅的侠义精神》,但这些文章均忽略了鲁迅侠义思想的真正渊源,其实仔细辨析鲁迅思想,不难发现鲁迅是以儒兼侠的。对于传统的儒学,鲁迅有着不自觉的承袭,而侠则是其儒学思想的行为外化,非单纯来自于墨侠思想。

侠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它虽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却不容置疑地弥漫于中国传统文化各个角落。中国侠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改造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主流文化,在历史的矛盾统一中,中国侠文化始终保持着其自身的独立性。只要提及侠,我们自然会想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一箫一剑平生志”、“纵死犹闻侠骨香”等义薄云天之语,侠总是与“公平正义”紧密相联的。韩云波在《侠文化:积淀与承传》一书中说:“中国侠文化中有血气方刚的正义与壮烈,有前赴后继的愤激与悲怆,也有许多美好的境界,是人生向上和向前的力量,是事业发展和进步的启示,洋溢于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中国侠文化恒久和广泛的魅力”<sup>[1]</sup>。诚然,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里,挣扎着痛苦的生灵,当他们的冤屈无处诉说之际,惟有侠成为了他们的希望与企盼,侠不仅是“以武犯禁”的武者的实践,也是“以文乱法”的文士的心灵。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侠出于墨实则是一种误解,其混淆了墨与侠的区别。冯友兰在《原儒墨》一文曾作过缜密考证,认为“贵族政治崩坏,乃有失去世业之流民,以杨成士之阶级”,“上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儒士。其原业农工之下层失业之流民多为侠士”<sup>[2]</sup>。他后来又作《原儒墨补》说:“在《原儒墨》一文中,我们所谓侠或侠士,本来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一种人。”<sup>[3]</sup>冯友兰由此得出诸子起于职业的划分这一结论,但这并不说明儒墨与侠有任何起源上的关系,对于侠来说,首要的是奉行侠义原则,实施侠义行为,他们分布于不同的学派、地域与职业群中,据此,韩云波将侠分别从儒、道、墨三家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从行为气质上说,儒家的阳刚好勇一派,与侠的人格气质接受为儒而好武,不接受朝廷俸禄,在身份上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处处以自己的原则行事,形成了上古意义上的儒侠”<sup>[4]</sup>。同时,他还征引《论语·学而》中曾子的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认为“用后世武侠标准来说,反省的三项内容,第一项是一诺千金,第二项是朋友义气,第三项是敬业精神”<sup>[5]</sup>。

以儒论侠在近代以章太炎为代表。他在《论儒侠》一文中讨论了《韩非子》的漆雕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废,而间

收稿日期:2012-03-30

作者简介:焦振文(1983-),男,河北涿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里游侠”<sup>[3]43</sup>,认为侠源于儒,提出了“以儒兼侠”的观点。同时,章太炎又从儒家之“义”和“用”与侠相通之处找到了二者的结合点。“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者乎?”章氏看到了儒家的“义”与“用”和侠的“杀身成仁”、“除国之大害”这种为伸张正义、快意恩仇的精神具有的相似之处。“也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兮,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sup>[3]43</sup>。可见,在章太炎看来,侠在根本上就是儒的一种,在高层次上,侠与儒是相同的。郭沫若在1925年为大儒王阳明所作《王阳明礼赞》一文似乎又可佐证章氏之论,郭沫若说:“他(王阳明)的任侠气概是他淑世精神的根株,他的骑射、词章是他武功、学业的工具。”在郭沫若看来,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儒的确如章太炎所说的“也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同时,章太炎还于1935年6月6日作《答张季鸾问政书》对“儒侠”进一步鼓吹“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妖妄之神话,淫荡之小说……)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从中,我们可见儒学内部与侠的紧密联系。

民国年间的尚侠思想就是将儒家以忠义为中心的国家民主大义,贯穿于中国侠文化的传统中,文公直《碧血丹心·自序》说:“自髫龄以至如今所得读之书——无论其为经史子集,或说部戏曲——每觉其中多少涵有坚强雄毅之忠侠性。”这种忠侠也即孔子所说的“大勇”以及孟子所提出的“大丈夫”。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指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在儒侠那里包括了对国家的忠、对师门的敬、对朋友的义、对大众的爱、对爱情的忠贞等方面的美德,表现在行为上是正气凛然、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二

鲁迅思想是复杂而多元的,儒侠是其思想的一方面。当然鲁迅对于墨家的原侠思想也十分推崇,于此前人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鲁迅的这种儒者之侠思想的形成是无意识的且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

作为从晚清走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历史中间物”的存在,鲁迅身上既有几千年中国以儒为主兼容释、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的传统文化不自觉的承袭,更浸染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任侠尚气的总体精神风貌。就文化传统的因袭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在早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曾呼唤“匡救”中国的“明哲之士”应该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邦失固有之血脉”。在《坟》也曾写道:“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光明的地方去。”<sup>[4]</sup>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固有之血脉”的继承是构成鲁迅思想文化人格的一个重要因素,鲁迅童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家庭环境再加上他长房长孙的特殊身份都使他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血液,曹聚仁说:“鲁迅作品中还有着浓重的传统思想,这也是真的。”<sup>[5]22</sup>

鲁迅的故乡绍兴地处钱塘江以东,理论界称之为“浙东”。著名学者王嘉良在《两浙文化传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缘性因素》中认为南宋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大儒开“浙东学派”之先河,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近代的章太炎、蔡元培、秋瑾等其流脉都充满着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叛逆精神,鲁迅的“硬气”文化人格的形成与浙东传统文化精神的潜在影响关系是不能忽略的,而且还可以在鲁迅与“乡先贤”的精神交流中一一找到对应,鲁迅极为推崇因反抗民族压迫而作殊死抗争的王思任、朱舜水就是证明。

鲁迅的思想最根本的还是儒家。在鲁迅思想与创作中,有着儒家的真气,他是真儒家,何谓真儒家呢?那便是“诚”。鲁迅在他的《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人脊梁。”<sup>[6]</sup>在这里鲁迅把儒与侠完美结合在一起,将个人道德与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内在自由与社会使命承担完美统一起来了,这种“拼命硬干”正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劲,对于什么是“韧”,这种“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正是儒家所讲的“为生民请命”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实质,而真正将其付诸于行动,则是侠者。侠之大,在“公”,也就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公,自身服从于这个公,而鲁迅的一生恰恰就是在践行着这种精神。

鲁迅的这种儒侠思想更为直接地来源于其师章太炎。自1908年鲁迅成为章太炎弟子后,两人的交往和精神联系便一生未曾中断,诚如,鲁迅曾写过好多纪念章太炎的文章,直到鲁迅逝世前一天还在写关于章太炎的文字。章太炎为晚清革命党人,他曾在《儒侠篇》大力鼓吹儒侠精神,提出“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儒行》一篇”(见《制言月刊》)第二十四期)。章太炎的“以儒兼侠”对鲁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参加光复会,思想里逐渐产生了儒侠的因子。伍图在《鲁迅的一九〇五年》中曾对比过鲁迅与章太炎:“两人的经历和性格也不完全相同,章太炎对金钱没有概念,但鲁迅日记中记账却极为精细;……但在内心,鲁迅和章太炎的精神气质却有太多相同点:一样的孤傲,一样的怀疑,一样的嫉恶如仇,一样的永不妥协。……章太炎在同

盟会时期就以骂人闻名,而鲁迅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骂遍文坛,并且夫子自道:骂人是中国极普遍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不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骂。”

鲁迅对于章氏的服膺不仅在于学术,更在于其“精神病气质”,章太炎曾被革命党在《民立报》的标题中称为“章疯子”,鲁迅也曾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记叙其所干的疯事,文章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并述其大闹总统府、砸毁物品等行为。章太炎在讲演中承认“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精神病人,断不敢想,就是想也不敢说……”因此,对于中国五千年的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概括只能出自鲁迅的“狂人”之口。

除章太炎外,鲁迅同乡有“鉴湖女侠”之誉的秋瑾也是鲁迅非常敬慕的,秋瑾是一位革命党人,鲁迅与她曾在日本有过交往,1907年秋瑾被杀,鲁迅激愤不已,但鲁迅并未当下写出愤世之作,而是冷静思索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而后创作了《药》,因此有学者指出“夏瑜”是对女革命家秋瑾的影射。1919年5月鲁迅在与《药》同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还有一篇杂文《圣武》,文中指出:“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许……所以不会相干。”

至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了鲁迅儒侠的原因,而两千多年传统礼教使他具有了不自觉的承袭,但浙东学派及其师友的影响又使其对不自觉承袭的儒学加以改造,使其思想中既有儒学忠孝仁义传统观念,比如为尽孝道而尊父母命娶了朱安,为尽长子之责,担当起抚养照顾老母弟侄等责任,“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以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sup>[9]</sup>。同时又有侠者之风,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在更多层次上实现了儒侠的统一,做到了以儒兼侠。

### 三

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世界里充满了以儒兼侠的色彩,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故事新编》里的那篇《铸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历史变迁》中,就对中国古代的侠义小说进行过系统梳理,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唯独对这篇《铸剑》推崇有加,他在致黎烈文的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不久,他又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的认真”,这颇见出鲁迅先生对侠义小说的偏爱。

《铸剑》讲述复仇的故事,它通过宴之敖代人向封建暴君复仇而体现出了侠义精神。小说取材于《列异传》、《搜神记》等古书,但鲁迅却并非机械照搬,而是在故事中灌注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对故事进行了改编,有学者将小说中的“黑色的人”说成“墨者”,指出“鲁迅在此实在是隐喻这个黑色的人是一位名人,行侠仗义的墨家‘老实’的古侠形象”<sup>[7]</sup>。这恐怕不免有些牵强附会,黑色是鲁迅的最爱,在鲁迅许多作品中均有黑衣、黑色等意象出现,但据此推出与墨家关联则显得颇为武断。黑衣人宴之敖代人复仇,这种“轻生死,重然诺”精神确实是侠义之所为,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去帮助百姓杀死荒淫暴虐的统治者,这也符合儒家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的儒侠精神。鲁迅《故事新编》中另一篇小说《出关》同样肯定了儒家积极进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小说通过孔老之争,孔胜老败的结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者。”<sup>[8]</sup>

鲁迅的杂文对现实针砭时弊,被看作是“匕首”和“投枪”,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像侠客一样佩剑持刀,除暴安良,行侠仗义,而是以笔为刀、为枪,对当权者的暴政,对不公平的现象进行口诛笔伐。我国自古就不乏儒侠知识分子,唐代诗人王维曾作诗云“谁人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大诗人李白更是极富儒侠色彩,他一生以侠自诩,渴望自己也能像古代侠客一样建功立业,名垂后世,如他在《侠客行》里就歌颂了侯嬴、朱亥两位侠客的壮举,“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sup>[9]</sup>。诗人一直渴望能够像他们一样,“千秋二壮士,焜赫大梁城”。可见,在文人骨子里具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儒侠思想,文人借助文字来表达出对时世的不满和对统治者的反抗。侠客的剑是侠客立身之根本,文人的笔则是体现自己价值理想的依凭。文人用笔墨书写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用笔墨唤起民众去战斗,这是具有正义感和民族良心的文人的一种普遍选择,这就是中国儒侠精神的体现。鲁迅选择杂文这种最具有“战斗性”文学样式,无疑也是找到了最适合他“行侠仗义”的武器,他的杂文具有明显的“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士风范,比如《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对于“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揭露和抗争,《而已集》对国民党杀戮中国革命青年的声讨,《且介亭杂文末编》是对国民党施行法西斯专政独裁的抨击等等。

鲁迅的儒侠思想还体现在其他作品里的复仇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仇”并非私仇,而是“公仇”,是为人民、为国家复仇,是侠者所复之仇,这也是仇者在最高层次上的含义。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对侠曾这样说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章太炎在《儒侠篇》也曾讲到:“世有大儒,故居侠士而并包之”,他将儒与侠连为了一体,儒为侠提供了意识形态,侠是对儒学理论的实践。孔庆东同样将知识分子即儒者与侠联系在一起来说:“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同的。”

鲁迅的复仇意识首先立足于民族大义的立场,发出对压迫和侵略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复仇。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歌颂了西方的“精神界战士”,志在发出民族复仇的呐喊,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以恶声报之”。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向几千年吃人礼教的复仇,对其进行了诅咒:“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活活在上”;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中更是言辞激烈地向旧礼教、旧制度发起进攻:“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饱暖,三要发展。苟且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还是百宋千金,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散丸,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种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的复仇意识,其实就内含有“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死》,那里面引用了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文的版画选集所作的序文,并录有他的遗嘱,最末一句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鲁迅对此是赞同的,因此他曾说过:“一个都不宽恕!”的话,这又反映了鲁迅复仇态度的坚决。这恰体现了侠者对自己信仰的坚守,对自己所仇视的东西的执著——死追猛打,绝不宽容。诚如《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中所说:“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还……不与聚邻”,鲜明地表现了侠者重情尚力、视死如归的复仇精神,侠的复仇又与舍生取义的“义”紧密相联系的,而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又恰是儒家所尊崇的。

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鲁迅先生思想是多元的,又是辩证统一的,正是这多元的思想因素才成就了鲁迅的深刻,才成就了鲁迅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巨大贡献,鲁迅将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 侠文化:积淀与传承[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 [3] 章太炎. 儒侠[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4] 鲁 迅.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杂文全集:上.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6.
- [5] 曹聚仁. 鲁迅评传[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 [6] 鲁 迅. 花边文学·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M]//鲁迅杂文全集:下.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104.
- [7] 陈江华. 侠之狂者——论鲁迅的侠义精神[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 [8] 鲁 迅.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M]//鲁迅杂文全集:下.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4.
- [9] 王 琦.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u Xun's Confucian Xia Thought

Jiao Zhenwen, Han Yan

(College of Humanit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Lu Xun's thoughts is a diverse, but also a dialectical unity, contains Confucian Xia thinking, in this diverse ideological factors. Toward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Lu Xun has unconsciously inherited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while Xia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Lu Xun; traditional culture; Xia culture; Confucian Xia; Lu Xun's novels

(责任编辑 王 作)